

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一部重要历史 文献——《杨文弱先生集》

张显清

《杨文弱先生集》是明末杨嗣昌的文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手钞善本。全书五十七卷，三十二册，另有目录一册，约近八十万字。杨嗣昌之子杨山松弟兄编辑。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常德）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万历、天启两朝历官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等。崇祯初年为霸州兵备。崇祯四年授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崇祯七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崇祯九年秋起为兵部尚书，崇祯皇帝“大信受之”，“奏请无不听”。崇祯十一年六月，改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谷城复反，“帝大惊”，特命杨嗣昌以大学士督师出征，前往湖广陕川指挥围剿以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军。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阳，福王被杀；二月，张献忠攻陷襄阳，襄王被杀。朝野震惊。杨嗣昌畏罪自杀。（《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杨嗣昌的经历表明，在明末农民战争发展的关键时期，他既曾主持中枢，参予朝廷的决策；又曾亲临前线，指挥对农民军的剿扑。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他实是一个与农民军相对抗的重要角色。他的文集中的大部分疏稿和信函正是他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记录。

我们在北京看到的这部手钞本《杨文弱先生集》，前无序，后无跋；既无编辑年月，也无刊刻时间。这就为我们确定其成书和刊印年代增加了困难。孙殿起《贩书偶记》曾这样断定，“《杨文弱集》五十七卷，明武陵杨嗣昌撰，崇祯间刊”。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根据可靠的材料证明，该书是杨山松弟兄在清康熙年间编辑的。杨山松系杨嗣昌长子，杨嗣昌督师时曾跟随左右供职，荫袭锦衣卫指挥。嘉庆十八年修《常德府志》卷三十九《杨山松传》说，“入国朝，撰《孤儿吁天录》雪父冤，购求祖、父文集，哀录若干卷”。同治元年修《武陵县志》卷三十五《杨山松传》也说，“入国朝，撰《孤儿吁天录》雪父冤，购求祖、父文集，哀录成帙”。《县志》所云乃因袭《府志》而来。它们都告诉人们，在清初，杨山松弟弟曾购求、编辑其祖父杨鹤、父亲杨嗣昌的文集，而且已经收聚抄录了“若干卷”，编排“成帙”。

杨山松在《孤儿吁天录》的《凡例》中更加具体明确地记述了他编辑其父文集的情形。他说，“先太傅（即杨嗣昌）已订年谱八卷，文集大约四五十卷，亦欲次第付梓，约费千金以上，二千金以下”，但因“家世世离，止恃穷途托钵”，故此“尚不知告成之何日也。”这部已经编出“大约四五十卷”的未定文集，当即是我们看到的五十七卷本《杨文弱先生集》的前身。《孤儿吁天录》的《凡例》写于康熙十九年冬。当时，五十七卷本的《杨文弱先生集》尚未完全编就，因此“崇祯间刊”的说法显然与事实相悖。

该书由杨山松“哀录成帙”后，曾经杨嗣昌之孙杨农正、杨农基等作过校对。但在杨山松、杨农正两代，都未能将其付梓，到了杨嗣昌的曾孙辈才给予刻板。钞本大部分在卷终都分别标有

杨嗣昌的曾孙杨绪、杨绍、杨缙、杨缙^①等“授梓”的字样，例如，“杨文弱先生集卷九终 曾孙 绪授梓”，等；但也有少部分在卷终末尾没有标明这样的字样；个别的卷尾只标“曾孙 授梓”，而缺名字；卷三十三末尾眉批则云“此叶后原本有缺”。这些都表明，在康熙末年，杨嗣昌的曾孙们曾将该书付梓刻板。同时，这些彼此处置相异的情形还启示我们，这部钞本很可能是以原稿本作的底本。

我们查阅了一些明末清初（或稍后）编的书目和丛书，没有发现五十七卷本《杨文弱先生集》之目，见到的只是杨嗣昌的选集。这进一步证实了该书在崇祯年间未曾刊印过。崇祯十一年编辑的《明经世文编》中没有收入杨嗣昌的任何文稿。陶珽的《说郭续》第二十八收有杨嗣昌《武陵兢渡略》一卷。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在杨嗣昌名下只列有《野客青鞋集》一书之目。《明史·艺文志》史类列有杨嗣昌《督师纪事》五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卷六〇列有杨嗣昌《薛文清年谱》一卷。《山阴吴氏遁庵丛编》收有杨嗣昌《召对纪实》一卷。另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只载有杨嗣昌的天启刻本《地官集》九册。

这些丛书、志书、目录书中所反映的情况，与杨山松在《孤儿吁天录》《凡例》中所讲的杨嗣昌的著作情况基本一致。《凡例》说，“先太傅文集早年曾有《诗箴》、《野客青鞋集》、《地官集》之刻；晚年曾有《抚关奏议》、《宣云奏议》、《中樞奏议》、《督师载笔》、《乐饥园诗集》之刻，卷帙浩繁，不啻充栋。其板藏家园别业者，松生也晚，不及典守。至《抚关》以

^①杨绪，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杨绍，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杨缙，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杨缙，康熙二十年举人。见同治元年修《武陵县志》卷三十一、卷三十二。

后，板藏京师常德会馆，即经鼎革，以砌在夹墙中，为此庵胡公·呵护得免于难。寻遭乡里匪人，身在台省，反以此充薪火付之一炬焉，毒矣。然幸多方搜购，亡而复存者尚十之八九。海内诸公，倘有收藏《抚关奏议》以下五种，幸惠一音，……，不惜重购”。阅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在明末曾有以上几个选集单独刻过板，而不曾有一部系统完整的杨嗣昌文集问世；《抚关奏议》等晚年的五个集子的刻板，在清初已“充薪火付之一炬”，因此杨山松在康熙年间编文集时，不得不“重购”这五种散佚文稿。

经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这部文集经由杨嗣昌之子杨山松等搜集整理，在康熙二十年前后基本编成后，在康熙末年（或稍后）由杨嗣昌的曾孙们付梓刊印。但由于在明末和清代，杨嗣昌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的声誉不佳，因此该书印数可能不多。这大概是它的刊印本在目前已经比较少见的一个原因。

文集卷一至卷四十二为奏疏，共605件。其中卷一至卷四，为万历四十五年八月至天启二年五月任户部主事、郎中时的自陈和代部堂具拟疏稿，主要是陈述征集“兵饷”、“辽饷”事宜。卷四至卷八，为崇祯四年九月至八年十二月任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山海关永平等地巡抚、宣大山西总督时期的奏稿，主要是陈述边防和对清兵作战情形。卷九至卷四十二为崇祯九年底至十四年初任兵部尚书和督师时的疏稿，占全部奏疏的五分之四，其中除一部分陈述对清兵作战情形外，大部分是关于奏请如何镇压农民军的。

卷四十三至四十四为《召对纪事》，是崇祯十年四月至十二年九月，杨嗣昌位居中枢和入阁时期，崇祯皇帝召见廷臣的谈话记录。它记载了明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关于对农民军作战的重大

军机决策，其中也涉及到对清军作战的方略。《山阴吴氏遁庵丛编》所收之《召对纪实》，仅为崇祯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七月初四日两次召对之纪实；而《杨文弱先生集》则收入召对纪事十七条。前十六条，每条各为一次召对之纪事；第十七条为十二年九月督师出京前多次召对的情形。所以文集中的《召对纪事》要比《山阴吴氏遁庵丛编》中的《召对纪实》丰富得多。

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三为书信，共486封。多为写给在前线指挥对农民军作战的明军将领和地方大员。例如，熊文灿、洪承畴、孙传廷、郑崇俭，陈新甲、付宗龙、余应桂、林铭球、王鳌永、宋一鹤、丁启睿、邵捷春、张克俭、史可法、方孔炤、左良玉、陈洪范、刘元斌等。在书信类中，还有几份散发给农民军的“谕帖”，如《谕流贼曹操罗汝才等》、《谕诸贼》等。这些书信和谕帖，同奏疏一样，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卷五十四至卷五十五，诗词。

卷五十六至卷五十七，杂著。

崇祯十一年初至十四年初的三年，是明末农民战争由高潮跌入低潮，又由低潮转入高潮的大转折时期。这是决定起义是半途而废，还是继续前进的三年；也是决定明王朝生死存亡的三年。但是，起义是怎样由高潮降落为低潮的，又是怎样由低潮重新上涨为高潮的？张献忠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地位应该怎样评价？杨嗣昌在这个时期的奏疏、召对纪事、书信乃至诗词等著述，为我们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因为他主持朝中戎政和督师前线围剿正与这个时期相始终。可是，应该提到的是，在建国以来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论著中，援引这部有重要史料价值文献的并不很多；而通常多是征用《绥寇纪略》、《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等书所转引的第二手资料。这也许是长期以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或者言而不详，若明若暗；

或者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的原因之一。

研究这部文集所提供的史实，我们对这三年多的历史可以得出如下的几点基本认识。

一、关于崇祯十一年前的战局。崇祯十一年初张献忠谷城受抚的前后，起义正处在鼎沸的高潮。农民军的势力正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发展，已拥“百万之众”；西北、西南、江淮楚豫、闽广，“所在见告”；流亡载道，民怨纷腾，农民军有着强大的后盾；张献忠虽然在南阳吃了败仗，但仍保有很强的兵力。与农民军蓬勃向上相反，官军却深深地陷于势穷力蹙，朝不保夕的困境中。它兵力空虚，战场上“无剿贼之兵”；军心涣散，哗变不断；军中无有可食之粮，“军饷甚危”，“盗饱我饥”，“士众嗷嗷，餬口无资”；清军不断进袭，腹背受敌，不得不从围剿农民军的战线上调兵入卫勤王。在这有利于农民军，不利于官军的形势下，如果不是张献忠接受招抚，而是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局面，那么将会大大加速战争的进程，早日结束明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关于战局的这个特点，在杨嗣昌以下的奏疏和有关书信中反映得十分清楚。这些疏稿是：

《犬马十年遇主疏》（文集卷九，崇祯十年三月）

《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文集卷九，十年三月）

《再上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文集卷十，十年四月）

《复陈孝廉封疆残伤已极疏》（文集卷十一，十年四月）

《丁丑（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召对》（文集卷四十三）

《复赵职方安内须图全局疏》（文集卷十五，十年五月）

《复楚抚楚寇益狂疏》（文集卷十五，十年五月）

《秋防届期疏》（文集卷十五，十年五月）

《复廷抚剿贼部咨方到疏》（文集卷十五，十年五月）

《湖湘贼势转炽疏》（文集卷十九，十年九月）

- 《密筹剿贼急著疏》（文集卷十九，十年九月）
 《请旨责成剿贼第二事疏》（文集卷十九，十年十月）
 《请旨责成剿贼第四事疏》（文集卷十九，十年十月）
 《恭报边兵发完疏》（文集卷二十，十年十一月）
 《丁丑（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召对》（文集卷四十三）
 《南方盗贼渐起疏》（文集卷二十二，十一年二月）
 《据报近日贼情疏》（文集卷二十二，十一年三月）
 《探得军情疏》（文集卷二十五，十一年七月）
 《交代钱粮疏》（文集卷三十五，十二年十月）
 《交代兵马疏》（文集卷三十五，十二年十月）

二、关于明王朝的招抚政策及张献忠谷城受抚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崇祯十年年底至十二年夏季出现的明王朝以招安诱降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攻势高潮，是封建统治阶级妄图摆脱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的产物，阴谋以政治上的分化瓦解弥补军事、经济上的力量不足，以军事围剿与政治诱降相结合的两面手法扼杀起义，拯救危机。面对着农民起义的遍地烽火，崇祯皇帝哀叹道“此贼杀得尽否？”因此一再批谕，必须“剿抚并行”，并且亲自批准了张献忠谷城就抚。他还针对主剿派官员反对招安张献忠的议论斥责道，“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张献忠在谷城“造房种田，正是招抚好处，又要散遣往那里去？”杨嗣昌也为招抚政策大造舆论，反复论证招抚政策之势在必行。例如他说，“流贼蜂起垂二十年，为中原大害。若论经常之理，一剿而外，更有何词？及其恣横，遍七八省，党类至百万余，剿之不可胜剿，不得不开抚之一路，以杀其势。此皇上至仁面命，臣等再三商酌而后允行，非无见而漫尝也。”又说，“且流寇数十百万，诛之不可胜诛，必须剿抚兼行，斯可消散其党。皇上武英面命，臣愚在部奉行。”他责备主剿派“不思国家之兵力实不能兼

御夫内外，国家之饷力实不能两给于中边，即一时文武诸臣之材力心力，欲左投左效，右投右效者，不啻受受乎难之？”崇祯皇帝和杨嗣昌的话已经把招抚政策的实质和目的暴露得清清楚楚。然而，作为农民军主要领袖人物的张献忠却未能正确地估计当时的斗争形势，也未能识破敌人的政治阴谋，接受了招抚，中了奸计，适应了敌人策略上的需要。在招抚逆流的冲击下，江淮楚豫十五家农民军将领除革、左、马三部外，其余均纷纷仿效张献忠，或者投敌叛变，或者接受招安中止武装斗争。大起义已濒临于瓦解毁灭的边缘。这乃是崇祯十一年初至十二年夏季战局的基本特征。杨嗣昌在论述当时之所以出现这样“聚讨招安”，“降者接踵”的局势时，是将其归功于“剿抚兼行”政策的。他说，“恩威并用，剿抚兼行，是以秦中大股渐次荡平，郟襄之间招纳有绪。……（今后）仍用前法，诛其不服，宥其来归，或可不难定也。”又为熊文灿辩护说，“理臣在二年之间收拾楚豫江淮十分亦有六七。……而试思，边警长驱，贼氛暂敛，中原江楚不受同时煽动之尤，伊谁之力？可将抚之一字，一笔抹煞？”杨嗣昌在这个时期的很多奏疏和书信都是围绕推行“剿抚兼行”政策而写的。例如：

《钦承圣问再沥愚心疏》，疏后有崇祯的谕批。（文集卷二十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参见《孤儿吁天录》卷三。

《戊寅（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召对纪事》（文集卷四十三）

《复兵科招抚之功罪疏》（文集卷二十四，十一年四月）

《恭承召问边腹情形疏》（文集卷二十五，十一年七月）

《再奏贼情疏》（文集卷二十五，十一年八月）

《剿抚已妨行间疏》（文集卷二十六，十一年八月）

《遵旨密议疏》（文集卷二十六，十一年九月）

《复南枢抚贼未可轻信疏》（文集卷二十六，十一年九月）

- 《看详章奏密请圣裁疏》（文集卷二十七，十一年十月）
 《复南监西贼复清疏》（文集卷二十八，十一年十一月）
 《谨据申报验票录请圣裁疏》（文集卷三十，十二年二月）
 《天恩准赐敕书谨再酌陈二义疏》（文集卷三十，十二年二月）
 《塘报贼情疏》（文集卷三十，十二年二月）
 《恭承召问补陈剿抚情形疏》（文集卷三十二，十二年四月）
 《密奏疏》（文集卷三十二，十二年四月）
 《军前必资群策疏》（文集卷三十五，十二年十月）

三、关于张献忠谷城再起后的英勇斗争及其历史地位。张献忠虽然在谷城一度接受招抚，但是他与叛徒刘国能、王光恩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谷城，他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并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清了地主阶级招抚政策的实质，终于在十二年五月重新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在玛瑙山残败后的恶劣环境中，他巍然屹立，力挽狂澜，为挽救起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争。经过严酷斗争的洗礼，他不仅敢于斗争，而且提高了斗争艺术，在不利的战局下，组织积极正确地战略退却，切断封锁，突破包围，转战楚陕川，终于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于崇祯十四年二月，攻陷襄阳，处死襄王，使农民军转危为安，把大起义重新推向了高潮。李自成、张献忠相继攻陷洛阳、襄阳，标志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相持阶段已经结束，大反攻的胜利进军即将到来。此后，农民军遂“势成滔天”，“不可复制”，“襄洛之陷，明室之所由以兴亡也。”因此，张献忠虽然在谷城受抚问题上犯过战略性的错误，但总观其全部斗争历史，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而且，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中期，即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在各支起义队伍中，张献忠为首的部队力量最强，张献忠活动的江淮楚豫川战场是全国战争的中心，抗击了明军的大部分兵力。因此，自崇祯九年高迎祥牺牲，至崇祯十四年春季李自成打入河

南，明王朝一直把张献忠作为主要战略攻击目标，提出了“先行献忠之诛，余贼以次第翦灭”，“只要活拿张献忠，其余尽赦不问”的战略口号和“四正、六隅、十面网”，“势如圆盘，点滴不漏”的大围剿战术。张献忠起义军在这个时期的英勇斗争，对于挽救起义免遭夭折，为大反攻开辟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杨嗣昌的奏稿和有关书信，为我们保留了张献忠在谷城再起至攻占襄阳这一危难时期顽强坚持武装斗争情形的宝贵资料。例如：

- 《密奏疏》（文集卷三十三，十二年六月）
《复郧抚塘报贼情疏》（文集卷三十三，十二年七月）
《塘报贼情疏》（文集卷三十四，十二年七月）
《微臣尤愤日甚疏》（文集卷三十四，十二年七月）
《君恩旷世难逢臣罪没齿无怨疏》（文集卷三十五，十二年八月）
《微臣引罪蒙恩廩荷督师重委疏》（文集卷三十五，十二年八月）
《微臣受命远行敬陈愚悃疏》（文集卷三十五，十二年九月）
《己卯（十二年）九月初一日至初六日奉命督师数次召对》
（文集卷四十四）
《审察贼情酌定兵计疏》（文集卷三十五，十二年十月）
《确探贼情实陈天听疏》（文集卷三十五，十二年十月）
《贼势南趋断宜急疏》（文集卷三十六，十二年十一月）
《新抚誓不附逆疏》（文集卷三十六，十二年十一月）
《军中用间多方疏》（文集卷三十六，十二年十一月）
《确探贼情再陈天听疏》（文集卷三十七，十二年十一月）
《部限已及剿功未成亟请臣罪疏》（文集卷三十七，十二年十二月）
《钦遵敕谕殄渠赦胁疏》（文集卷三十七，十二年十一月）
《申明暂驻襄阳之说疏》（文集卷三十七，十二年十一月）
《备述献贼孤穷亟宜悬赏购缚疏》（文集卷三十七，十二年十二月）
《飞报献贼西奔疏》（文集卷三十七，十二年十二月）

- 《再报献贼西奔情形疏》（文集卷三十七，十二年十二月）
- 《擒贼正在此时再行飞调疏》（文集卷三十八，十二年十二月）
- 《楚兵大挫具实上闻疏》（文集卷三十八，十二年十二月）
- 《飞报玛瑙山大捷疏》（文集卷三十九，十三年三月）
- 《文武议论可采疏》（文集卷三十九，十三年三月）
- 《生获逆献军师疏》（文集卷三十九，十三年三月）
- 《察奏捷功疏》（文集卷四十，十三年四月）
- 《微臣驰至彝陵适接擒降献党疏》（文集卷三十九，十三年三月）
- 《飞报官兵连战异常大捷疏》（文集卷四十，十三年四月）
- 《备陈调度机宜疏》（文集卷四十一，十三年五月）
- 《恭报微臣进驻梁山疏》（文集卷四十一，十三年十月）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行将问世

为适应中国小说史研究和大专院校中文系教学工作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小说史料丛书》，选择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品，采用较好的版本，加以整理标点。考虑到建国后古典小说的出书情况，避免重复，这套丛书侧重选收未曾出版过的宋代以后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也酌量选收，同时选收较重要的弹词作品。

这套丛书的第一批选题初步拟定，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列举的几个方面的主要作品，如宋元话本、元明讲史小说、明代“神魔”小说、明清“人情”小说以及清代一些“狭邪”“侠义”小说等，大都包括在内。目前正在与有关方面征求意见，准备陆续编辑校订出书，有计划地供给研究工作者参考。

微 沫